

颜师古《玄言新记明老部》的诠释体例与思想特色

张世亮

(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5)

【内容摘要】颜师古的《玄言新记明老部》在经典诠释方面有自己的鲜明特点。他将《老子》八十一章看作一个严密的逻辑系统,通过精炼的语言提点和勾勒出了《老子》一书的逻辑层次和结构体系,透显出了极其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同时,《玄言新记明老部》受到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合流互补思想氛围的影响,其批判、吸收、融合儒释资源的特色也很明显,在此基础上体现出了较为清晰的道教化倾向。

【关键词】颜师古 《玄言新记明老部》 解题 解经 三教融摄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1)05-0090-02

《玄言新记明老部》为唐初颜师古(581-645)所作,现存敦煌写本,且为残卷(以下凡《玄言新记明老部》之名皆简称为《明老部》,不再一一注明。关于《明老部》残卷的成书年代、抄写时间等史实问题,限于研究旨趣,本文不拟作详细探讨,具体可参考《唐史论丛》第五辑所载李斌城先生《敦煌写本〈玄言新记明老部〉残卷研究》一文的相关论述)。笔者通过对残卷《明老部》的考察和研读,可以看出,颜师古在经典诠释方面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从现存的解老、注老著作(甚至可以推扩至其他的经典诠释作品)来加以考量,我们可以说《明老部》可谓是开一代风气之先的作品,它对后世的经典诠释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颜师古充分吸收了南北朝以来的注释成果,将《老子》八十一章看作一个严密的逻辑系统,通过精炼的语言提点和勾勒出了《老子》一书的逻辑层次和结构体系,这无疑为后学研究《老子》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切入角度和解读模式,透显出了极其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隋唐时期,儒释道三教合流互补的思想逐渐成为一大趋势,《明老部》受这一大的时代氛围的影响,其批判、吸收、融合儒释资源的特色也较明显,在此基础上体现出了较为清晰的道教化倾向。

一、经典诠释体例及其特色

《老子》一书自形成流布以后,历朝历代注解者不绝如缕。隋唐以前,注解《老子》较有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严遵《老子指归》、王弼《老子道德经注》等。从这些注老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它们基本遵循了经典诠释的一般体例模式:即章句训诂、随文而注、文字疏释、义理衍演等。而颜师古注解《老子》却独辟蹊径,呈现出了新的特点:

第一 解题 概括全书宗旨。

颜师古在《明老部》第一卷“老子道经上”的开始,就对

《老子道德经》做了解题的工作,以此来标明概括出《老子道德经》全书的宗旨。

颜师古认为“题称老子”是有两方面的含义的:一为“约形相为言”,一为“据义训为释”^{[1]P319下}。“道”与“德”则是相资以为用的,二者不可一无。“道是真境之理,德是至人之智。理境无拥,故谓之通”,“有道而无德,无以见其通;有德而无道,无以表其德”^{[1]P319下}。因此“道”与“德”要并提,这样才能使人达于“至人之智”,而冥会“真境之理”。“通题经者”,取其“成就人生”之引申义,并训以“常、法”二义,以此表明《老子》一书是要标揭一“无迁变”之理和永恒之道。^{[1]P319下}这里所要表明的“常道”,在颜师古理解,就是“治身治国”之理,也就是“内圣外王之道”。“治身治国”则融摄于“道器”之辨,而对于“道器”,颜师古则以“有无”来加以解说。以“治身”为例,“身为得道之器”是“有”,而“道则是无”。人生的烦恼与负担皆是生于“身”之“有”,“寻累之所生,生于贪欲”,因此“治身治国”,其关键就在于要“无欲无为”。^{[1]P320上}从以上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颜师古以“有无”释“道器”的理论无疑是对魏晋玄学尤其是王弼思想的承续和进一步发展。

第二 解经 关注逻辑结构。

从颜师古对于《老子》本经(道德上下)的解读,可看出其明晰的注释态度,将《老子》八十一章作一整体之观照,看作一个有机的差异统一体,重点关注各章之间的逻辑关系,强调《老子》各章形成了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这种在解经方法论方面的自觉创造与之前的各种解经著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将经典诠释的工作推上了一个崭新的层次,同时也凸显了作者在逻辑分析和方法建构方面的能力和优势。

颜师古的《明老部》可以称作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创造性工作。他认为《老子》道、德上下二经以及八十一章的章卷之分不是随意而作,而是秉持一定的原则和标准而形成的。他

* 作者简介:张世亮(1982-),男,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

说:“道经象天,所以言上,德经象地,所以言下”^{[1](P319下)};“分篇上下,法象天地”^{[1](P322下)}。上下之分是有其象征意义的,即效法天地之分。同时,“道德二篇,通象阳数极九,以九九为限,故有八十一章”^{[1](P320上)}。八十一章的章次之分也有其根据,以九九归真之数而加以比拟,这也隐喻了《老子》八十一章所要呈现的就是永恒的真理。

《明老部》认为《老子》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上下经所阐发的根本精神是一致的,“道德冥会,不二不一”^{[1](P322下)}。同时,颜师古认为在上下经和各章的展开论述中,却也是各有重点、各自有别的。他紧紧围绕“治身、治国”、“道、德”、“有、无”、“境、智”等核心范畴,对《老子》各章进行了环环相扣的逻辑演绎,从而描绘出了一幅生动形象的“差异中求统一”的立体画卷,指出对于《老子》的理解不能落于苍白贫乏的纯粹概念化活动,而《老子》的真精神实在于“顺自然之真”、“贵无欲无为”,世人应以此来指导我们“治身治国”的现实人生,而成就“内圣外王之道”。

二、三教融摄及其道教化倾向

两汉之际,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在之后的几百年间,其发展呈现出了一个由弱到强的态势,至南北朝隋唐时期而达至顶峰。在佛教发展的刺激下,产生于东汉末年的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也逐渐摆脱其发展初期理论上粗浅幼稚、无完整体系的原始状态,而逐渐与道家学派中具有高度理论水平的经典作品如《老子》等发生密切联系。这样,道教就迎来了理论创建和发展的良好局面,中经葛洪、陆修静等人的不断努力,至隋唐时,业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典籍系统,并与佛教以及中国本土所谓主流的儒家学术一起形成了三教鼎立的局面。儒、释、道三教虽处于鼎立的架构之中,但是它们却都是在相互融通、相互批判的过程中来寻求自身发展的。颜师古对于《老子》的诠释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学术背景下而得以展开的。他通过对儒、释资源的融摄,创造性地诠释了《老子》的哲学意蕴,体现出了较为明显的道教化倾向,为道教解经在方法论上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模式。

颜师古所生活的初唐时期,佛、道教虽然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出现了兴旺繁荣的局面,但占据官方意识形态的仍然是儒学。儒学不仅在作为制度伦理的层面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发生紧密关联,同时作为一种学术资源它也时时影响着士林阶层的思考路径。颜师古在解读《老子》时就具有融合儒学、援儒入道的特点。如他在《明老部》卷一“老子道德经”解题中对于“经”的解释就援引了儒学的资源:“通题经者,是待纬之名。《孔子家语》云:‘经纬其文。此譬犹组织,直者为经,横者为纬,皆成之义也。’”^{[1](P319下)}《孔子家语》虽有后世伪托之嫌,但论其学术性质,还是应该划归儒学典籍。另如《明老部》卷一,颜师古在对《老子》道经第二十章作解时读时说:“第廿绝学章,所以次绝圣者。前既通示志遣,此则总明贤圣。但贤人由学而得,故以学居前。圣人本自生知,故直言反俗而已。”^{[1](P321下)}对于“圣、贤”的解说,颜师古在这里也明显是借鉴了《论语·季氏》中“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2](P177)}的论述。

南北朝隋唐之时,佛、道二教在互相辩驳融摄的过程中,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层面都取得了长足的拓展和进步。颜师古在解老时立足于道家道教的本位,对佛教资源进行

了批判与融合。

首先,他对于南北朝齐梁以后以至唐初所流行的解经体例中的“科段之分”进行了批判,而“科段之分”与南北朝时期盛行的“佛经科判”则密切相关。科判,又称科分、科文、科段、科章、科节等,指的是僧人解释经论的一种方法。科判之学在初起之时,由于以“得意忘言”、“举本统末”的思想为基础而较为简略,至刘宋兴盛以后则呈现出了越来越琐细的发展态势^{[3](P414-419)}。这种区分章段的繁琐注释方法也逐渐影响到儒、道的经典义疏。颜师古就是针对此而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他说:“寻晋宋之前讲者,旧无科段。自齐梁以后,竟为穿凿。此无益能艺而有妨听览。”^{[1](P320上)}这种解经模式穿凿繁琐,舍本而逐末,是没有什么好处的。颜师古认为“乾坤之道,贵存简易。今宜从省,皆设而不说”^{[1](P320上-下)},对于经典的解读要在于作一整体之观照而提点出其宗旨、分析其逻辑关系结构。正是基于此种态度,颜师古作《明老部》是将《老子》各章看作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而加以总体的梳理,而非只是执着于繁琐的文字疏释。关于语言文字,他也只是从整体的层面对《老子》一书的行文风格、作法即文法特点总结为二:其一是“单句特出,的标一理”,这种是属于“辞约义该”类型的;其一是“终始数行,共成一意”,这种是属于“言旷事简”类型的^{[1](P320下)}。

其次,颜师古在解读《老子》时融合了佛教资源。在这一点上,《明老部》体现得较为明显。“有、无”是《老子》所探讨的一组核心范畴,颜师古在对这一范畴进行解读演绎时就多处引入了佛教中“空”的观念,如“但即身之道,道则是无。无即道之身,身则是有。有则有累大患,所以见空之士,不有其身”^{[1](P320上)}、“前既通辨君臣,此则合说空有”^{[1](P321上)}、“第廿一孔德章,所以次绝学者。前既对辨忘执,执则失真。此明双遣有空,空故合道”^{[1](P321下)}等。颜师古引入“空”的观念来释与“有”相对之“无”,以及引入佛教“执”的概念,这些正是《明老部》援佛入道的明显例证。

《明老部》在融摄儒释的基础之上还体现了较为明显的道教化倾向。如颜师古在论述“身”与“道”的关系时说“明治身者,身为得道之器,道亦不离于身”^{[1](P320上)},这体现了明晰的道教理论特点。另外,颜师古所提出的“兼无兼有”、“遣有入无”^{[1](P321上)}、“双遣有空”^{[1](P321下)}以及“道德冥会,不二不一”等解老观点,实际成为了以成玄英为代表的道教重玄学之思想先导,具有重要的学术思想价值。当然,至于颜师古本人是否在实践中与道教本身发生过紧密联系,这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与考证,但若仅从其所作《明老部》的方法论建构、经典诠释特色和思想内容来看,我们可以说颜师古及其《明老部》在中国老学史上是具有极大的学术和历史价值的,它无疑成为了道教哲学从葛玄到成玄英这一理论发展、成熟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和重要环节。

参考文献:

- [1][唐]颜师古.玄言新记明老部[M].藏外道书·21册[Z].成都:巴蜀书社,1994.
- [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3]汤用彤.汤用彤全集(第一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